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菲利普·米罗诺夫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人民出版社

非利浦·米罗其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人 民 出 版 社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Филипп Миронов. (Тихий Дон в 1917—1921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осква 1997

© В. Данилов, Н. Тархова, А. Венков и др. составители.

©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7

本书中文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 号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俄罗斯)丹尼洛夫

(В. Данилов)等编;乌传袞,温耀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主编)

ISBN 978-7-01-007897-7

I. ①菲… II. ①丹… ②乌… ③温… III. ①顿河哥萨克叛乱(1917)-史料

IV. ①K512.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948号

菲利普·米罗诺夫

FEILIPU MILUONUOFU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俄]B. 丹尼洛夫等编 乌传袞 温耀平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63.75

字数:1101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07897-7 定价:13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A. A. 德米特里耶夫 B. II. 科兹洛夫
C. B. 米罗年科 B. II. 纳乌莫夫 P. Γ. 皮霍亚（副主任）
E. M. 普里马科夫 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C. A. 菲拉托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B. 丹尼洛夫 T. 沙宁（以上为责任编辑）

Л. 德沃伊内赫 B. 维诺格拉多夫 O. 纳乌莫夫

编纂人员：

B. 丹尼洛夫 H. 塔尔霍娃（以上为责任编辑）

A. 文科夫 T. 戈雷什金 B. 孔德拉申 B. 米哈廖夫

H. 穆拉维约娃 A. 尼古拉耶夫 A. 拉斯捷利亚耶夫

A. 费多连科 П. 切尔诺皮茨基

乌传袞 温耀平 译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 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 葵	黄书元	鲁 桓	戴秉国
魏 华	臧乐安				

卷 首 语

《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 20 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 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 69 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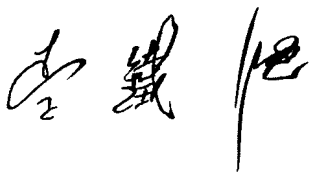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2007 年 9 月 30 日

序 言

就整体而言,1917—1921年期间发生在顿河地区的所有一切,都是俄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两种基本力量的搏斗具有特别残酷无情和毫不掩饰的性质。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顿河地区的这场拼搏更加旷日持久和更具破坏性。

使历史学家、作家和政论家们特别关注,也许是最为关注的,是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这个异常辉煌和英勇人物的形象和业绩。这位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今伏尔加格勒州谢拉菲莫维奇市)的哥萨克具有超凡的勇敢精神和军事禀赋,由于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现而荣膺包括金质武器在内的全部圣乔治奖赏和一系列勋章,并获得较高的哥萨克军中校衔,擢升至团长职务。其间,还早在1906年,米罗诺夫就曾表示反对使用哥萨克镇压1905—1906年间俄国城乡的骚乱。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解除军职(直到1914年间才再次应征入伍)。

1918—1921年期间,米罗诺夫处于顿河地区事态发展的中心。他曾力图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即在为夺取政权、获得土地、保卫粮食而进行极其残酷激烈斗争的条件下,实现和捍卫社会公正和自由的思想。他经常置身于正在搏斗的两种力量之间。其中每一方都不止一次判处米罗诺夫死刑。最终对他执行死刑判决的,恰恰又是他为之而献身的那一方。

论述米罗诺夫的历史研究著作¹、历史评论和文艺作品²,都从各种档案材料中撷取了大量文献资料。受到所有人备加注意的是米罗诺夫本人的文件——信函、呼吁书、命令、书面报告、电报、发言和亲笔撰写的回忆录。这些文件充满了作者本人的亲自观察所得和切身体验,而且表述得十分鲜明生动。还有,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著述人的真挚坦诚和对任何人都直言不讳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震惊。

两种情况决定了顿河地区事件的特点。其中之一涉及1917年十月事件以

后白军势力乃至整个反对红色政权的力量从处于革命高潮而又遭受饥荒的俄国中部地区大批撤往富饶而且至少倾向保守的南方,其中首先又是顿河地区和库班。志愿军正是在那里建立起来并筹划向莫斯科进军的,而在莫斯科城下遭到溃败后又回到了那一带。

造成国内战争在顿河地区极其残酷激烈的另一个,而且也是主要的原因,则与俄国各哥萨克地区的政治形势有关。其中,顿河军辖区在这些地区中之所以又占据首要地位,则是因为它相比之下更加靠近历史形成的俄国中央地带。

哥萨克是农村居民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一部分人,尽管他们出身农民,而且就其中大部分人来说,无论从劳动性质还是从生活方式而言,都是农民。哥萨克的繁重军役义务是以享有身份地位特权作为补偿的(尽管这种补偿远远不够),这首先是能获得较充裕的土地,而作为自治单位的哥萨克军拥有极其大量的土地则保证能做到这一点。

单个乡村或其部分群体(村镇及其附近村寨)范围内的自治系统,是一种哥萨克式的特殊的俄国村社,而在经营管理方面则履行着一般村社的职能,首先是组织使用土地和安排村际合作。但是,农民村社直接从属于国家(1861年以前则是地主)的管理体系。而哥萨克村社则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度与国家相抗衡的哥萨克军的自治体系。在18世纪末以前,各哥萨克地区经常成为农民反抗专制农奴制度的社会斗争的独特基地。然而,在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哥萨克便最终变成了隶属并依附于国家的军役阶层。哥萨克有效地起到了守卫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作用。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哥萨克又不时被用作一种军事警察力量,特别是被用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工人的反政府行动。

到20世纪初,哥萨克的“自由不羁”的日子只剩下了一些回忆。确实曾与国家制度分庭抗礼的哥萨克土地法规,诸如“不向顿河地区课收税赋”等,早就不起作用而被置诸脑后。相反,身份地位的封闭性迅速增长并日益巩固,这成为保卫哥萨克土地的主要手段,借以避免从人口稠密(相对于土地而言)的俄罗斯中央地带和环境恶劣的北方地区迁移到顿河地区、库班、奥伦堡……的农民“染指”。

下面让我们对20世纪初顿河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略加说明,因为否则就无法理解哥萨克地区国内战争的特点。

首先要谈哥萨克。在顿河军辖区内共有哥萨克150万人,占农村居民的47%。哥萨克军拥有的土地为1160万俄亩,占到土地总数的77.3%。顿河军的土地包括集镇份地(960万俄亩)和军队储备地(约200万俄亩)。集镇份地

按男性居民分配。1916 年计有个人份地 525404 块,即平均每块个人份地为 12.8 俄亩,也就是说,每家哥萨克农户拥有土地 52 俄亩,其中不仅包括属于个人使用的耕地和园地(果园和菜地),而且包括公用的草场、牧场、林场等等。哥萨克居民内部的社会分化十分明显。根据现今的统计数据,其中贫农占 24.6%,中农占 51.6%,真正富足的农民占 23.8%。在邻近俄罗斯农村的一些地方,哥萨克个人份地的面积约相当于整个顿河军平均个人份地面积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另一部分居民是早在改革前就在边境各管区——塔甘罗格、顿涅茨、顿河上游、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等地——形成的“本地农民”,其中,部分是原先的地主,部分是农村居民中的其他阶层。1917 年计有“本地农民”91.1 万人,占顿河军辖区农村居民的 28.5%。“本地农民”拥有土地 56.51 万俄亩,占总数 3.8%(平均每一名男性人口约有 1.25 俄亩)。根据此种土地拥有状况,对于竟有 20% 的农户没有土地和 40% 以上的农户只拥有少量土地(每户不超过 5 俄亩)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农村居民中的第三类人是所谓的“外地人”。自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最终废除原农奴对于地主的“临时义务状态”以后,农民从中部和北部各省向南方迁移的运动急剧加强。蜂拥而来的新移民迅即满布顿河地区、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一带。哥萨克对他们深怀敌意,拒绝他们定居和获得土地,把他们称作无权长期定居的“外地人”。这些人大多数陷于佃农或雇农的地位。1917 年顿河地区共有 72.1 万多外地人(据其他资料,这个数字还要大,约达 112 万人)。其中,49.6% 的人没有庄稼地,56.4% 的人没有耕畜。包括自有的土地和租种的土地在内,每名男性移民平均只占有耕地 0.06 俄亩。

此外,顿河军辖区并未完全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主要集中在塔甘罗格和顿涅茨两个管区。1912 年,全辖区境内计有地主庄园 4370 个,拥有土地面积 100 万俄亩。³

如同在俄罗斯全国各地一样,土地是推动顿河地区革命进程的主要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由于俄国不顾自己的实力而勉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夺粮食的斗争愈演愈烈。早在 1916 年,面临饥荒威胁的沙皇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强制征粮的做法,并着手组建“粮食征购军队”……

总之,问题在于土地和粮食。1917 年 5 月 14—24 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举行的顿河军辖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表明了顿河地区社会力量开始从政治上有意识地进行对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尔后的

事态发展进程。

在农民代表大会上表达了哥萨克正式立场的,是常常被人们称作“顿河夜莺”而不久之后又当选为顿河军军人会议主席(1917年5月26日—6月18日)的博加耶夫斯基。他后来又担任了军队阿塔曼^①卡列金的副手。当他应大会邀请作为报告人之一就土地问题发言时,博加耶夫斯基一开头便抛开“很快会被人们忘记”的“弟兄们等等”,声称“哥萨克有权说:土地属于他们哥萨克所有”,示威性地对农民主张所有耕者均有其田的权利平等的要求不屑一顾。

博加耶夫斯基愿意迎合“本地农民”的要求。他甚至同意把一部分军队储备地和某些地主的土地分给“本地农民”。他说:“这些土地……毫无疑问值得你们,农民们,予以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土地的使用可以既符合哥萨克的利益,也符合农民的利益……在塔甘罗格和顿涅茨两个管区有许多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洒满了你们的劳动汗水,应当最贴近农民的心胸。”接着他又说:“我们应当怎样来安排共同的生活呢?就土地而言,我应当说,我们会递上自己的毛巾,而你们,农民们,也会递上自己的毛巾。”

博加耶夫斯基不准备给外地人任何权利。不仅如此,他还试图把哥萨克和“本地农民”联合在一起反对外地人。他对“本地农民”说:“只有在和你们商议和谈妥之后,我们才能制订决定外地人命运的办法。”但是,哥萨克的利益高于一切。博加耶夫斯基宣告:“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⁴

博加耶夫斯基绝不是维护哥萨克利益的最狂热的分子。还有的人则宣称:“农民滚开,顿河地区不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⁵但是,博加耶夫斯基也并没有给农民留下任何希望。正如同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位农民所表述的那样,“在博加耶夫斯基先生讲到不需要谈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之后”,他“内心里变得万分忧郁,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处于迷雾之中”。⁶1917年春天哥萨克首领们的宣示在农民内心中留下的迷雾,必不可免地演化为农民对1919年春季清除哥萨克行动的支持。可知,不建立哥萨克与农民的兄弟情谊,就无法避免争夺土地的流血斗争。

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立场,可以根据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加以陈述,这些决议充满了普遍平等和享受充分权利的思想。《关于土地》的决议是大会一致通过的,并获得“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乌拉’声”。我们从中摘录一段如下:

① 阿塔曼(ATAMAH),哥萨克军队最高首领或哥萨克行政区划单位的领导者。——译者

“从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出发,即土地,如同空气和人一样,并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大自然母亲所创造,只是由于历史上错误地形成的条件它才被个别人和集团所强占,而这是违背劳动人民的道义情感和意识的,我们,参加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的全辖区农民和外地人的全权代表,据此决定:

一、永远废除俄罗斯国家境内的一切土地所有制。二、俄罗斯国家所管辖的所有土地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三、所有属于私人所有、公共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土地,无一例外地转归全体人民所有,不付赎金……五、俄国的所有男女公民均拥有使用这项全民财产的平等权利。六、只有用亲身劳动,并为农业目的耕种土地的人,才能使用土地。七、土地应根据劳动力平均使用。”在决议的总则部分之后,详细列举了“为了解决顿河军辖区内的土地问题”而向立宪会议提出的要求(共22条)。“所有土地”,包括哥萨克的份地在内,都应当纳入“作为全民土地资源的军辖区土地”,其使用权“扩及到俄罗斯国家境内的所有男女公民”——包括“哥萨克、农民及外地人,并无区别”⁷。

我们看到,顿河农民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本条款,完全符合于1917年5月4—28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收到的242份选民委托书而拟定的著名的《示范委托书》的内容,而且由在1917年春季进入决定性阶段的农民革命在俄国予以实现。

“提供粮食!”——这就是军队阿塔曼沃洛申诺夫和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申加廖夫向农民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要求。其间,他们还引证了饥荒的威胁和军队及城市中人们挨饿的真切事实。代表大会对这项呼吁予以响应,在《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中,表示支持实行粮食垄断制和规定固定的价格,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尽快实行对一切日用必需品的垄断,并规定它们与粮食价格相适应的固定价格的要求”。鉴于临时政府粮食机关正在实际征收粮食和牲畜,代表大会要求“首先征收地主、养马场场主和粮商的粮食,然后再向农民征收”。大会同意规定“劳动农民的粮食定量”,虽然也承认定量“过低”。⁸但是,农民代表大会的所有要求都未得到执行。国家按征集的办法对1917年的收成进行采购,成了促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演变成为反对临时政府政策的斗争的因素之一,并使这种斗争成为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政变的主要支柱之一。

1917年5月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的材料,足以使人认清当时顿河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顿河哥萨克的悲剧正是由这种局势引发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在俄国其他地区,革命把越来越多的最尖锐的问题——重新分配土地、消除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建立民主政治——提到首要地位,而整个事态的发展进

程却把哥萨克日益迅速地推向与俄国其他地区相对抗的境地。

哥萨克上层试图通过行政控制和地区封闭的办法把俄国中部汹涌澎湃的农民战争阻隔在外。在顿河地区,于1917年5月26日(新历6月8日)召开的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几乎就在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建立了以卡列金和博加耶夫斯基为首的顿河军政府,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宣告成立了一个维护身份等级制的哥萨克共和国。10月末,一得到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消息,军政府当即接管起全部国家政权,并实行了首先是针对顿河地区非哥萨克居民的军事管制。

卡列金政权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首先,它促使顿河地区大部分居民同自己对立起来;其次,它又极端错误地估计了回到家乡的前线哥萨克团队的政治情绪。关于这两方面,本文件集收入的第一份文件,即1917年12月15日米罗诺夫写给顿河军政府委员阿格耶夫的《公开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公开信提及正在觉醒的那一部分哥萨克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昭示于世的要求:“立即罢免军政府的委员,并立即按民主原则改选军人会议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是立即在顿河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并要使哥萨克在这些地方自治机关中有可能同军辖区内的非哥萨克劳动居民并肩携手前进,等等。”提出这些要求的日期是1917年9月3日。

米罗诺夫宣称:“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完全赞同这项决议。而如果这样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那么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即会自行消失,而顿河地区也可免遭涂炭!”后来在《关于顿河地区国内战争的回忆》中,米罗诺夫又提到1917年5月初他在故乡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讲话,其中说:“如今在顿河地区,既没有哥萨克,也没有农民,有的只是各方面都一律平等的公民。”(见76号文件)这样的立场,正如同我们从农民代表大会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是哥萨克上层人物绝对不能接受的,但在最广大的农民和贫苦哥萨克阶层中却获得信任和支持。米罗诺夫的这种立场,如同本书收入的文件所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顿河地区享有毋庸置疑的威信,以及为什么他会无论同“白军”的还是同“红色政权”的思想上不容异己的态度发生分歧和冲突。

1号文件(1917年12月15日的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其中陈述了米罗诺夫最初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看法是全然否定性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动势力是同盟者”,因为他们不仅不能相互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所有人。布尔什维克“对于保持俄国的完整无损”是令人忧虑的。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立宪民主党人“并非天然的”同盟者,因为后者“目前将会通过布

尔什维主义来攻击人民的成果”。

稍后,米罗诺夫又证实:“当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时,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同情……”(见7号文件)我们看到,这种“不同情”的态度在1917年12月15日的信中有所反映。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不同情态度很快开始改变。1918年1月3日,由米罗诺夫指挥的哥萨克第32团,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应从罗马尼亚战线开拔返回故土,并要在途中“占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从那里把布尔什维克击退”。团队按行军队形出发,并“公开宣称,我们不准准备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而将同他们团结一致”。(见7号文件)

1918年1月25日,在致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哥萨克的号召书中,米罗诺夫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的认识。这份号召书中说道:“总之,社会主义追求善良、完美、进步、平等;它渴望让公正、理智、自由取得胜利。”为了达到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各种社会主义政党“走着各自不同的道路”:“人民社会党说,50年以后我们会最终把土地、自由和权利统统交给人民”;右派社会革命党说,35年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说,20年以后;孟什维克派社会民主党说,10年以后。只有布尔什维克派的社会民主党说:“一切归于劳动人民,而且就是现在!”其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不承认要根据目前的条件逐步实现自己的要求”,也不承认“要同其他政党,特别是同资产阶级政党实现任何联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直截了当……”(见4号文件)最后,1918年3月9日,米罗诺夫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又说:“我是以审慎的步伐,而且经过多年的时间,才走近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但却是认真实在地走向这种思想,而且专一执著地对待自己的信念。”(见7号文件)

1918年春季,顿河地区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对此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莫斯科同意顿河军辖区实行自治,并全权委托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草拟自己的土地法案(随后交由人民委员会批准)。⁹(见141号及其他文件)1918年3月23日,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实际上只存在到1918年5月8日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以后攻占塔甘罗格和顿河畔罗斯托夫为止。结果,顿河地区的政权落到了克拉斯诺夫将军手中。他从一开始担任阿塔曼起,便不仅取消了一切苏维埃法令,而且废止了临时政府的法令,并宣告征讨苏维埃政权。转向和平生活的希望落空了。

1918年夏季,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顿河军向伏尔加河进军,企图夺占察里津,以切断俄国各中央地区从南方获取粮食的最后一通道。但是,这支军队还在顿河军辖区内就遇到了抵抗,而在梅德韦季察河和霍皮奥尔河上则同高举红旗

的有组织的一些哥萨克支队发生交战。其中人数最多而又最有战斗力的支队,正是由米罗诺夫和第一个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B. C. 科瓦廖夫组建的。

本文件集的一些文件(10—75 号文件)反映了红色哥萨克反对顿河军的斗争,具体说,就是于 1918 年 5 月末—6 月初响应米罗诺夫的号召(见 13、14、16、17 号文件)而成立的,在当地谢布里亚科沃“防区”行动的哥萨克游击支队的斗争。1918 年 7 月,这个支队扩建成一个旅,扼守着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线,到 1918 年 9 月又扩编为梅德韦季察苏维埃第 1 师(自 1918 年 11 月起为红军第 23 师)。米罗诺夫的这支部队于 1918 年 6—8 月份实施了艰苦的防御战斗,1918 年 9—11 月又参加了察里津城下的作战。1918 年 9 月 15—18 日,该师荣获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授予的两面革命荣誉红旗。(见 56 号文件)从该师战士集体报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库兹米奇(不指出名字和姓!)红旗勋章的申请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米罗诺夫的热情爱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 1918 年 9 月 28 日在三位第一批荣获苏维埃勋章的名单中赫然列入了“库兹米奇同志”。(见 57 号文件)

在实施进攻和击溃克拉斯诺夫军队,在为苏维埃俄罗斯收复顿河地区东部和北部各管区,以及在向南方——向新切尔卡斯克、向哥萨克的静静顿河地区主要部分——展开总攻中,米罗诺夫师是一个突击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 1919 年 1 月 12 日致米罗诺夫的电报中,向“您的功勋卓著的师”的战士们致敬,最后还说:“整个俄国都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你们。”(见 75 号文件)

尽管如此,虽然表现了坚韧不拔和英雄气概,把哥萨克组建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苏维埃师,而且在政治上同布尔什维主义明显靠拢,但是这名原“哥萨克军中校”,如同整个哥萨克群体一样,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心中仍然是令人怀疑的。斯大林 1918 年 8 月 4 日从察里津写给列宁的信在这方面就十分典型。在说明战线的严重形势时,作为原因之一,他提到“米罗诺夫的军队是由哥萨克组成的”,因为哥萨克“不能也不愿意同哥萨克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原来他们“整团整团地投到米罗诺夫方面”,是为了获得武器,查明红军部队的配置,“然后再把整团整团的人带回”给克拉斯诺夫。结果,米罗诺夫“自然”被“打得头破血流”。(见 46 号文件)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米罗诺夫继续扼守着察里津,很快又出现在击溃克拉斯诺夫分子的人们的队伍之中,并且发动了本可以使国内战争于 1919 年宣告结束的进攻行动。他本人的英勇果敢和他指挥的师的战果后来

被人们多次称颂(见 63 号及其他文件),但他却一直也未能得到红旗勋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奖励“库兹米奇同志”的决议卡在某处未予批准。

斯大林信中对哥萨克行为的评价,就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大部分人的观点而言,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国内战争事态的认识异常简单化,以及判断和评论问题的极端片面性和轻率武断,加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煽起了激越的政治情绪,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惨剧。至于无止无息的群众大会,以及个别人、成批的人乃至整团的人一再反复倒戈,这绝不反映斯大林在信中所认定的看法。这恰恰是一种在国内战争中确定立场的痛苦的选择过程。如果谈到参加国内战争的大多数人,那么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他们前去作战是不得不如此,出于无奈,本文件集所刊用的来自两方面的文件都说明了这一点。(见 9、11、22—26、28、30、36、45、55、62、66、70、73、76 号文件)

1919 年春季,清除哥萨克的政策在顿河地区演变成为残酷的流血形式,气氛可怖。这对米罗诺夫而言,是极其重大的考验。这一方面涉及他同故乡地区哥萨克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涉及他同政权的关系。这是文件集第二编(1919 年 1 月 15 日—7 月 25 日这一时期)陈述的主题。在对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清除哥萨克”这一概念具有两种颇有差别的内容。其一指的是消灭社会上身份地位的差异,这是一种早已成熟的民主行为,首先旨在消灭贵族的身份地位特权和农民所受到的身份地位限制。对于哥萨克来说,身份地位特权是同在世界大战年代已变得难以忍受的那种繁重艰苦的军役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在前线的哥萨克中出现了一种要求,那就是希望转而履行一般性的兵役义务,尽管这样有可能导致他们丧失拥有较多土地的特权和其他优惠。其实还在 1917 年 5 月的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¹⁰前面已经指出,当时米罗诺夫曾声言取消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异。同时我们也知道,1917 年秋季在顿河地区和其他哥萨克地区的许多村镇都决定要实行自己的清除哥萨克行动。¹¹

1917 年 11 月 11(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身份地位和文职官衔》的法令。¹²尽管在法令文字上并没有使用“哥萨克”字样,但从法律上说,哥萨克作为一种身份地位已被废止。

到 1919 年年初,“清除哥萨克”一词又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指的是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借以在很大程度上从肉体上消灭哥萨克以及通过把农民从俄国缺少土地的地区大批迁来的办法把哥萨克融化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老一代历史学家的记忆中(笔者也忝为其中的一员),牢固地保留着清除哥萨克政